

高尔基戏剧学校——

党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

□ 殷小娟 何兵兵

1933年3月6日,《红色中华》刊载了一则题为《开展文化战线上的突击——少共中央局征调团员组织蓝衫团》的招生消息,内容如下:“决定征调:(一)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二)身体健壮,能走路,没有疾病;(三)活泼;(四)愿受调动的团员四十名加入工农剧社准备组织‘蓝衫团’。被征调的各团员将受长期训练,科目有识字,读书,以及各种歌舞,游艺,音乐,新剧,活报……将来到各地表演,发展文化运动。”这是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关于组建剧团、征调学员的一则招生启事。尽管只有40个招生名额,却引起了苏区各界的关注,就此拉开了党创办第一所戏剧学校的序幕。

适应战争需要, 承担革命任务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1931年底,中央苏区第一个专业性剧团——八一剧团成立。1932年9月,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领导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专门机构——工农剧社总社。1933年,为进一步发展文化运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巩固苏区政权,少共中央局决定在工农剧社内部组建新的剧社——蓝衫剧团。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郑重发出招生启事。征调工作进展顺利,40个招生名额很快满额,学员来自兴国、瑞金、博生、公略等县。由于蓝衫剧团既是组织演出的剧团,又是招收学员的训练班,所以“蓝衫剧团”也叫“蓝衫剧团学校”。它便是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前身。

4月4日,在瑞金叶坪附近的一座祠堂里,蓝衫剧团学校正式开学。李伯钊兼任校长和团长,王普青、石联星、施英等任专职教员,沙可夫、钱壮飞、胡底等任兼职教员。学校总共招收了2期学员,第一期学员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顺利毕业。第二期学员于1933年10月开学。与第一期相比,这期学员除了有从地方上招收的工农青年,还有从部队上招收的红军战士,因此学校增设了一个红军班。蓝衫剧团学校旨在为战争服务、为巩



高尔基戏剧学校旧址

固苏维埃政权服务,其教学方针是让学员掌握戏剧运动及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常识,有组织地分派到各地的俱乐部、剧社、剧团去实习,在学习期间组织研究会,培养学员的创造性,是一所培养工农演剧干部、训练青年工农,使其成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干部学校。

明确办学方向, 规范办学制度

1934年2月,瞿秋白抵达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他认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因此建议将蓝衫剧团学校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3月,蓝衫剧团学校正式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直接管辖,李伯钊仍担任校长。学校除普通班外,还有地方班和红军班,其中地方班为苏区各县、区工农剧社培养专业人才,红军班为各军团政治部培养宣传干部。

为了健全学校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制定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简章首先明确了办学目的和任务,指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教育目的在于“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

埃文艺运动的人才”。其次,规定了入学资格,要求凡入学者须年龄在十六岁至十七岁,曾在革命机关或群众团体工作或参加革命斗争积极工作,“须得当地政府机关的介绍”,“对戏剧运动和文艺运动确有兴趣”,“文化程度须能看一二百字”。最后,确定学制内前一个月主要学习唱歌、舞蹈、活报、文字课和政治,后三个月主要学习俱乐部问题、政治常识和戏剧理论,其中戏剧理论包括舞台、剧本、排演三部分内容。此外,还对学员的课外教育作了妥善安排,要求学员“每天早晚练习跳舞、唱歌和军事操”;学习中乐、西乐,文艺故事、诗歌;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及各种突击运动。

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学以致用

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演出紧密结合。苏区青年刊物《青年实话》报道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学习生活:“学生们用冲锋的精神在学习着,他们要学会把握着艺术的武器,准备到文化战线上去突击。”学员学习和演出紧密结合,在学中演、在演中学。在讨论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时,着重强调学校要经常到火线上巡回表演、到镇上流动表演,并在《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中明确要求学员毕业前“到

各地的俱乐部、剧社、剧团去实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学校为了促进教学,提高学员的艺术实践能力,经常组织学员以小型戏剧队的形式排演活报剧、小话剧、歌舞节目,深入乡村、部队甚至火线上进行巡回演出。从1933年4月到1934年10月,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组织60多个演出队,走遍了中央苏区。

坚持艺术教育与现实斗争紧密联系。高尔基戏剧学校将宣传演出与当时的革命斗争、人民生活紧密相连。在宣传土地革命政策时,演出题材主要是揭露地主老财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的压迫;在宣传扩红运动时,演出题材主要是宣传工农红军一家亲、号召工农参加红军与白军作斗争。在艺术创作时,瞿秋白主张要深入群众进行创作演出,强调“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作出大众化的艺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作品:话剧《堡垒中的士兵》《抢粮》《游击》,舞剧《搜山》《突火阵》《冲锋》,小调、曲艺《红军打胜仗》《送郎参军》《消灭白狗子》等。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长征。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中央苏维埃剧团的一部分教师和演员随军北上,余部整编成“战号”“红旗”“星火”三个剧团,深入农村和战地工作,配合保卫中央苏区。1935年3月,“红旗”“星火”剧团的负责人先后牺牲,“战号”剧团负责人赵品三被敌人抓捕;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慷慨就义。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三个剧团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活动。

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1000多名宣传干部和文艺人才,创作了一大批文艺作品,有力推动了中央苏区戏剧运动和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学员在演出过程中“充分运用活动的宣传工具,来深入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将“普罗戏剧的火星散在各地了”,为巩固苏维埃革命政权贡献了力量。



烽火岁月的生死守护

□ 黎 声

1938年初,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冀中区党委在黄敬书记支持下成立了新世纪剧社。

1940年夏,黄敬听了新世纪剧社梁斌社长的汇报,对剧社的工作作出指示,他要求:“新世纪剧社今后除了演戏唱歌之外,还要像只老母鸡那样工作,下蛋孵小鸡,下很多的蛋,孵很多的小鸡,把冀中的文艺工作活跃起来。”

为落实黄敬的指示,剧社分成若干小组到定县、安平、安国、博野等县招收了400多名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村剧团骨干,开办了两期文艺训练班。冀中平原大地一时出现了“村村有剧团,处处有歌声”的景象,剧社如同洪流般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激励着冀中军民的抗日热情和革命斗志。

1927年8月8日,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1940年5月,未满13岁的我就投身革命,加入了新世纪剧社。社长梁斌是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是剧社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业务上的多面手,他能写能导能演,一手持枪、一手拿笔,创作不断、演出不停。当时,他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身上背着长枪、腰别手榴弹,一脸英气,健步如飞,身后队伍中有人挑着两盏汽

灯,还有两匹骡子驮着幕布和道具。梁斌带领我们上前线为战士和老乡们演出,曾经演过的剧目有《血洒卢沟桥》《爸爸做错了》《放下你的鞭子》,演出反响强烈。乡亲们说,新世纪剧社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剧社”。

舞台上有一个情节是几个日本鬼子追赶两个中国姑娘,演到这里时,战士和乡亲们群情激昂,发出阵阵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看到日寇占领东北,父女二人不得不以流浪卖艺为生时,人们屏气凝神、泪流满面,听到女孩哭泣着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有的观众悲愤得顿足捶胸,还有人同情地向舞台上扔铜板 and 银元。

我的家乡定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北部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地,军区后方供给处就设在定县西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日军为稳定后方,配合太平洋战场,对冀中发动了空前惨烈的大“扫荡”,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我们新世纪剧社有六七十人,都是文职人员,且多是女演员、小演员,没有武器装备,没什么战斗力。梁斌总是想方设法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冒着枪林弹雨,一直在

白洋淀地区和敌人“捉迷藏”。因为战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敌人的“扫荡”是长期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新世纪剧社宣布解散,把人员分为四个组,隐蔽在附近的几个县里。

我隐蔽在沧州地区的一个小乡村泗水岸村的一户农民家里,对外说我是大娘的大闺女娟子的女儿。大娘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

1942年夏天闹蝗灾,庄稼被毁得很厉害,老乡们用自己做的工具打蝗虫吃。大娘家也打了很多,拿回来把蝗虫的头去掉,洗干净,在锅里炒熟,用红高粱面饼裹着吃。

我吃完后身体很不舒服,先是头疼,接着肚子疼,随后四肢抽搐起来。大娘见状,着急地说:“哎呀,这是得了绞肠痧,治疗不及时会死人的!前几年咱村得这种病的,因治疗不及时,死了两个人呢!”大娘二话没说,急忙让娟子姐把我背起来,找到村里一位会治这种病的老大娘。老大娘让我躺在一块门板上,全身上下扎了100多针,躺了一个多小时,病情才慢慢好转。娟子大姐高兴地说:“你这个丫头命真大!”

过了没多久,听说日本鬼子要进村清查人口,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娘家。大娘看我只穿了一件短袖小

褂,关爱地说:“天快凉了,你穿得太单薄了!”她连忙找到一块和小褂颜色差不多的布,把我的短袖小褂缝成了长袖褂子。临走时,我抱着大娘哭了,我真舍不得离开她们母女!

新世纪剧社在战火纷飞的5年里,出没于枪林弹雨,转战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既是一个演出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走遍了冀中平原,受到冀中人民的厚爱和欢迎。

1940年至1947年,我先后在冀中新世纪剧社、抗大七分校文工队、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1947年9月至1955年9月,我在中央机要局从事译电工作,曾任译电股长。1945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

如今,我已经98岁了。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是那些诞生在枪炮声中的剧目和歌曲,却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所湮灭,它们不时地在我耳畔回响,特别是房东大娘和娟子姐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一样,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培训部副局级组织员)

刘公岛,对于中华儿女来说,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种警示和教育,更是一个难以释怀的心结。这座小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黄海之滨的威海湾内,面积3.15平方公里,在近代素有“东隅屏藩”“世外桃源”“不沉的战舰”之称。在这里发生的甲午海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灾难,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当时东亚甚至整个世界的格局。

到达威海湾时,天空乌云密布、细雨绵绵,给我伤感的心情又增添了几分凝重。同行的好友问,还要不要登岛。我毫不犹豫地說:“要上,一定要上!”

风雨中,轮船慢慢靠近码头。不远处,民族英雄邓世昌的雕像映入眼帘:伟岸的身形,披着长披风,手持望远镜,他眉头紧锁,神情肃然,站在甲板上观察敌情。这正是刘公岛的标志性建筑。

凝视着雕像,我的脑海里闪现出电影《甲午风云》中黄海大战的激烈场景。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激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随后,他亲自掌舵,开着伤痕累累的致远舰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殉国。尚未登岛,我的心灵已被深深震撼,邓世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感染了我,无比钦佩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这是时人对邓世昌这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的赞誉。

海岸不远处,矗立着一块褐色巨石,上面镌刻着“威海海疆”四个大字,字体苍劲雄浑、笔锋刚健有力。史料记载,“刘公岛”这个名字已有400余年历史,最早传说它是“海上刘氏别业”。说岛外住着一户刘姓人家,在岛上也有他的产业。因此,从元代到明朝初期,南方海船经过这里停泊,都称它为“刘岛”或“刘家岛”。到了明末,岛上修了刘公祠,香火甚盛,岛名也逐渐发生改变。明隆庆六年,在官府奏章和皇帝的诏令中,这里被正式称为“刘公岛”。

刘公岛真正为世人所铭记的,是19世纪末那段屈辱而又悲壮的历史。1888年,清政府北洋水师成军,刘公岛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的诞生地。兵勇云集,舰船齐聚,这里一度成为清朝的坚固海防屏障。然而,在1895年2月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这段历史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

100多年来,只要提起刘公岛,人们耳边就会敲响警钟,心中就会涌起阵阵伤痛。“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老的海,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我背身后的尽是圣人的遗骸!母亲!我要回来,母亲!”闻一多写下的这首《七子之歌·威海卫》如诉如泣,让人心酸泪目。

岛之上,甲午殇。刘公岛,已然成为民族警醒之岛。

漫步刘公岛,刚刚被雨水冲刷过的青石板,更加洁净厚重。它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尘烟里,仿佛在低吟着那段历史悲歌。北洋海军舰船停泊的铁码头、威海水师学堂、公所后炮台……每一栋建筑,每一件文物,都能让人触摸到它历经沧桑的坎坷岁月和忍辱负重的内心剧痛。

站在东泓炮台前,眼前不时闪现出当年激战的悲壮场景。东泓炮台是刘公岛上北洋水师火力最强的炮台。甲午海战打响后,它凭借自身优势,协同日岛、南帮炮台,重创多艘日舰。当时,海面上硝烟四起,战火弥漫,喊杀声、炮火声一浪高过一浪。



□ 孙现富

炮火燃烧了战袍,鲜血染红了黄海。最终,东泓炮台因被敌人炮火摧毁而失守。“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我的耳边响起梁启超振聋发聩的警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勇敢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之歌。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筑起抗击侵略的钢铁长城。1942年,在刘公岛西南方向100余公里的马石山上,10名八路军战士放弃突围机会,“四进三出”包围圈,最终以生命为代价救出了1000余名陷入日寇重围的乡亲。在战士们心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永远高过自己。同样在马石山下,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宁肯舍弃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八路军的后代,在反“扫荡”和多次“迁徙”中,1223名乳儿无一伤亡。在她们朴素的认知中,虽然不能上战场杀敌,但守护好革命后代的安全,一样是为抗击日寇作贡献。这就是英勇的齐鲁儿女,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英勇抗敌,共同铸就了一部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壮丽史诗。

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刘公岛这座古老的岛屿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早已远离战火硝烟的刘公岛,静静安卧在辽阔的威海湾里,温暖且安详。1992年,刘公岛国家森林公园由原国家林业部命名,成为全国第一个海上森林公园。刘公岛自然风光优美,历史文化深厚,如今,又多了“海上仙山”的美誉,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刘公岛教学区。来到这里的人们,在感受历史风云变幻的同时,也会受到教育和警醒,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浪花滚滚,海鸥声声。挥手告别刘公岛时已近黄昏,远远回望刘公岛,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天水相接之处绽放出一片霞光,在秀丽风光映衬下,这座见证了百年风云变幻的岛屿在我心里更加雄伟,更加苍劲……